

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摘录)

周 恩 来

〔说明〕1959年4月29日，周总理曾邀集六十岁以上的政协委员举行茶话会，并在会上讲了话。这里摘录《中共党史资料》（第五辑）。

在分组会上听了几位老先生的发言，很有感触，觉得有必要和大家谈谈工作安排问题，希望过了六十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这是从已故的程砚秋那里得到的启示，程砚秋同志的艺术修养很高，解放后在政治上作风上也有很大进步，但总还是有点孤僻。在旧社会，他是孤身奋斗出来的，养成了洁身自好的习气，不大收徒弟，因此他的唱腔也就流传不广。解放以后，我曾劝他收徒弟。今年纪念他逝世一周年，算了一下，他的徒弟不过十几个。程派唱腔又难学，徒弟们还没有学好，他就去世了，录下的唱片也不多。从这个问题联想到，凡有一技之长的老年人，总是多给社会留下一些东西好。

我们都是过六十岁的人了，至少是戊戌年出生的。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在座的都经历四个朝代：清朝、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时间过的很快，开国至今已经十年了，如果不抓紧，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五四”运动距今才四十年，那时候的事情现在的青年们已经不大了解了，对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的情况他们就更不熟悉了。现在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反映新的情况，但对过去的东西也要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产生、发展和衰亡的。那些典型人物，他们所代表的那个社会虽然灭亡了，有的本人也死亡了，但事迹可以作为史料记载下来。我国大小凉山有过半奴隶制，现在已经进行了民主改革。西藏是农奴制，再过几年也要改革的。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要勇于暴露旧的东西，“五四”时代就提倡叛逆精神。一个人的转变不是偶然的。我如果有时间，也愿意写点东西暴露自己的封建家庭。对袁世凯我不熟悉，谁要写蒋介石的历史，我还可以供给一些资料，两次国共合作，我和他来往不少。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人们都赞扬我国

的古代文化，其中就包括很丰富的历史记载，不仅有正史，还有野史、笔记等。汉文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要把自己所掌握的历史遗产贡献出来。

写东西不一定只限于文化史。在座的有搞军事的，可以写军事史，如从八旗、湘军、淮军、新军一直到国民军队的发展史，都可以写。在座的还有不少工商业者，可以写我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也可以写其中的一个行业，如银行、纺织业等。其它如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也都可以写。

紫 金 山

旧志云：紫金山一名麦山，其地宜麦，故名。唐太宗尝猎于此。今按山距城西五里，其上有金山寺，内有宋建隆陀罗尼经幢，以幢计，寺或为唐时所建，寺南俯黄河，面嵩邙，高耸开拓，邑人重九登高于此，颇为一邑胜概云。

（见民国《孟县志·地理上》）

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 的性质和任务

黄 森

〔编者按〕本文是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黄森同志在全国政协文史干训班上的发言讲稿。现将一、二部分摘录转载，供大家参考。

一、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性质

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在一九五九年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倡导下开展起来的，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包括全国政协、地方政协在内的全国文史资料工作的体系。在各级政协、历届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领导下和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全国征集文史资料达四亿多字，出版史料一亿多字。这样大规模地、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史料征集工作，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创举。这项工作在自身发展中，已经形成了它独特个性，为史料的积累和研究开创了新的领域。是否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特点：

1、政协文史资料与文献资料、实物资料不同，它是一种口述资料，是历史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和亲闻、亲见，是对历史事件的追忆和记述。

口述资料在历史资料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近百年来，我国社会处在大动荡时期，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北洋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战火连绵不断，政权几次更迭，文书档案有的毁于战火，有

的在迁徙中流失。有的则限于当局的立场，记录不完全客观，甚至有的失实的。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的回忆资料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弥补文书档案之不足，有的甚至可以匡正历史文献的谬误。一九六五年，周恩来总理在四届政协常委会议上，推荐《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八辑一篇文章，其中讲到袁世凯如何玩弄权术挟制当时的内阁总理熊希龄解散国民党的经过。这件事发生在袁世凯的办公室里，只有袁、熊二人知道，在文献上是不可能记载的。现在由熊的密友郑廷玺以回忆录形式发表出来，就补充了历史文献之不足。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2、政协文史资料与专业性资料（如工运、青运、妇运资料）相比，具有范围广、内容多的特点，它是综合性的近代史资料。它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教、科技、民族、宗教、华侨、社会以至三教九流等各个方面。因此，它可以为各有关部门广泛利用。

3、政协文史资料部门也与一般文史资料部门不同，它是政协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全国政协章程中规定：（略）通过撰写史料，大家回顾了近百年来中国外受帝国主义欺侮，内受反动统治阶级压迫的惨境，以及中国革命斗争的历程，个人曲曲折折的经历，从而进一步认清时代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同时，通过事实更进一步明确过去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依靠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拯救了中国；今天也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统一战线，才能振兴中华。

4、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不仅向史学界提供研究资料，而且还直接出版了可供广大读者阅读的历史知识读物。我们的史料是来自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和亲闻、亲见，不但记事，而且记人，有具体生动的情节，真实可信，令人喜读，可收到一般史料所不能收到的效果。

二、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任务

第一，征集史料。

这是我们全部工作的基础，是第一位的任务。征集的时限上起清末戊戌维新，下迄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范围如上所述，我们采取广征博集的方针，已征集了大量资料，但各个门类，各个地区发展很不平衡，一般地说，军事、政治方面资料较多，其它方面较少，尤其是民族、宗教、华侨、社会等空白点甚多。今后如何进一步征集，要从各地的情况出发，确定各自的主攻方向。有的地方反映现在稿源，已日趋枯竭。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如果同过去比较，现在来稿下降了，这是事实，但不能说已无潜力可挖了。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近、现代史那么丰富，决不是几亿字可以囊括的。比如军事、政治的稿件，过去虽然征集较多，但也不是没有薄弱环节。就以我们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打算编辑出版的抗战史料丛书来说吧，我们掌握的资料有六、七百万字，加上各地掌握的估计不下千万字，应当说资料够充分的了，可是一经分类选编，就发现我们的资料还有不少空缺。有的资料由于过去受“左”的影响，不能客观反映历史真实，现在有的作者要求抽回重写；有的看到我们的出版预告后，纷纷来信表示愿意提供资料或提供线索，这说明还是有潜力可挖的。至于军事、政治以外的资料，则有待我们以更大的努力去开拓征集。有些重要历史人物，由于过去我们思想不够解放，视野狭窄，没有注意征集，现在应当有计划地尽可能地把他们的史料征集起来。近年来，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各业务组在研究加强征集工作问题时，都注意把视野放得宽些，更宽些。文化组的同志提出，打算以《走向文艺之路》为总题目，动员作家、艺术家、音乐家、美术家、舞蹈家把他们如何艰苦奋斗走上文艺之路的资料写出来，

据说反应很好。用这种办法，可以调动撰稿者的积极性。社会组正在酝酿搞一个《名僧》录，到佛协去联系，他们也很积极，从三十多位名僧中选了十五、六人，并向我们提供了撰写人_们的线索。有些人可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但他们是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也应当征集他们的材料，过去我们的征集工作局限于国内，对港澳和海外很少去触动，现在统一战线扩大了，开放政策进一步贯彻，国内外交往扩大，我们文史资料工作也应当做到海外去。那里是一个未开发的史料宝库，我们应当想方设法，积极加以开拓。

征集资料，实际上很多是带有“抢救”性质的。从广义上说，一九五九年周恩来总理召集六十岁以上老人开会就带有了“抢救”的性质。那时六十岁的人，现在已八十五岁了。现在我们讲“抢救”，主要是对年逾古稀而又有重要史料的重点人物来说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有点紧迫感。煤炭、石油埋在地下，你不去开采它，它永远是宝藏。史料你不去抓紧征集，就会人亡史没。因此，这个问题必须从纷繁的日常事务中突出起来。要有全面规划，有力措施，和相应的政策，要有专人负责，争分夺秒，努力完成。再不能议而不定，决而不行，贻误时机了。

“抢救”确有一定的难度，同志们可以总结和互相交流经验。但不管怎么样，总离不开“三勤”，腿勤（登门拜访），嘴勤（向征集对象做思想工作），手勤（有材料就记录下来）。做这个工作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你“抢救”了一份史料就立了一个功，“抢救”愈多，功劳愈大。

征集史料，以口述资料为主，但也不要放弃对函电，日记、照片等实物资料的征集，这些资料往往是口述资料的有力佐证。

关于征集的分工问题，第四次全国文史工作会议上曾规定：中共党史（包括军史）资料，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征集；属于

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工作，群众运动等史料仍由政协征集。当然这里面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必过于严格划分。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希望我们在这方面密切配合，只要我们不过多涉及纯党务工作就可以了。

第二，整理研究史料。

顾名思义，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不但负有征集资料的任务，而且负有研究资料的任务。当然这种研究与历史研究是不相同的。我们主要是通过对资料的整理进行研究，目的是把征集到手的资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给历史研究部门提供丰富而可信的材料。

研究并不是高深莫测的事。我们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的文章都是研究的成果。当我们审读稿件的时候，研究工作就开始了，比如鉴别史料的真伪，判断史料的价值，核实史料的情节，甚至评定稿酬，这都是不可缺少的研究工作。

当然研究工作不止于此。在资料征集已有一定基础的地方就要把资料工作提高到系统化、专题化的程度。所谓系统化、专题化，就是把纷繁而又零散的资料按照历史阶段、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按照历史的内在联系进行分类，列成专题，逐步配套。比如我们征集的军事资料有三千九百万字之多，军事组的同志，根据资料内容拟逐步整理出：（1）国民党对苏区的五次“围剿”，（2）国民党军对红军长征的围追堵截（以上是内战时期），（3）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十二册（从九一八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4）辽沈战役，（5）平津战役，（6）淮海战役（以上是解放战争时期）等专题资料。这样就把军事方面的资料成龙配套了。

地方政协要独立进行这样庞大的整理是困难的，但就某一方面的专题把资料系统起来则完全可以做到的。如西北诸省、区搞“五马”，广东省搞孙中山在广东三次建立政权，广西自治区搞

国民党桂系，天津市搞租界、洋行与买办，重庆搞国共重庆谈判、国民参政会等。这项工作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政协文史资料就会给我们的国家，给我们后代子孙留下一笔丰厚的史料遗产。

实践证明，我们及时把整理研究系统化、专题化的问题提出来，有许多好处：1、可以摸清我们资料库存的底数，使多年积存的资料活用起来；2、可以针对我们现有资料的薄弱环节，有计划地开展新的征集和“抢救”工作；3、可以及时请健在的当事人帮助我们核实、补充、订正材料；4、可以使我们的出版物在《选辑》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一步。

第三，编辑出版史料。

这是文史资料工作的最后一道工序。我们征集资料也好，整理研究资料也好，都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要把资料提供给社会，为历史研究、历史教学和文艺创作工作者所利用。这就要搞好我们的编辑出版工作。

我们的出版物，不但要有一定的数量，更重要的是要有高的质量。要确立质量第一的思想，把好“三关”。第一，要严格把好政治关，使我们的出版物有利于促进新时期总任务、总目标的实现，有利于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大团结、大统一，有利于两个文明的建设，而不是相反。第二，要把好史实关，史实要立准立好，要是非清楚，“不要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笔”（周总理语），不让谬种流传，祸及后人。第三，要把好文字关，语法修辞、标点符号都要仔细推敲，达到准确通顺。

开展书评活动，定期评选优秀文史读物，对优秀者给予精神和物质的鼓励，促使文史读物质量不断提高。

孟 县 概 况

(一)

孟县在河南省西北隅，焦作市西南，属黄河平原。全县地形西北高东南低，形成了西岭、南滩、东平原三足鼎立之势。东临温县，以猪龙河为界；西与济源县、洛阳市吉利区接壤，南濒黄河，与孟津、巩县隔河相望；北连沁阳。全境东西长33公里，南北宽25.7公里，总面积为546.6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占52.3%，水域占14%，现人口为28万余人，以汉族为主，间居少数回、满、蒙、彝、苗、土家和塔吉克等族。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县份之一。平均人口密度为581人/平方公里。境内有蟒河自西北向东南横贯而过、经谷旦、城伯、缙村、城关、化工、南庄等乡，长34.5公里。

孟县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气温年平均14.225℃，年降雨量平均为614.2毫米，但多集中在夏季，为全年54%；冬季最少，仅26.4毫米，占全年的4%；年日照总时平均为2493.1小时；年平均无霜期为209.8天。四季分明，光热资源充足，水资源较丰，适宜农作物生长，全县盛产小

麦、玉子、棉花、大豆、花生、谷子和其它多种菜类，是河南省著名的粮食高产县之一。

(二)

孟县古称河阳，又称孟州，地处中原腹地，历史悠久，物产丰富，为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之一。孟县据文字记载，已有三千多年的文明史。明洪武十年（1377）废州为县，始称孟县，属怀庆府。民国三年（1914）属河南省河北道，后改为豫北道。民国十六年（1927）道废，直属河南省，后改属河南省第四区行政公署辖。1941年日本二次侵占孟县，在县城设“伪公署”。1945年4月，孟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是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伪县公署解散，该年9月3日孟县城解放，到1947年7月8日全县解放，孟县抗日民主政府改为孟县人民民主政府，1949年8月16日划归平原省新乡专署，改孟县人民民主政府为孟县人民政府。1952年11月平原省撤销，改属河南省新乡专区。1954年改孟县人民政府为孟县人民委员会。全县划为14个中心乡。1958年中心乡废，成立十个人民公社。1967年12月30日成立孟县革命委员会，属新乡地区革命委员会辖。1973年3月将吉利、槐树两个公社分为吉利、石庄和槐树、东小仇四个公

社，1978年吉利公社划归洛阳市，1980年1月复立孟县人民政府，属河南省新乡专署，1986年2月，新乡行署撤，改属焦作市辖。

(三)

孟县文物较丰，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四：韩文公墓祠、显圣王大殿、冶墙仰韶文化遗址和义井龙山文化遗址。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古建三座：岳云宫大殿，位于县城南关，创建于元代；观音堂（俗称无梁庙）位于县城东北梧桐村，重修于大明嘉靖年间；二佛殿位于城伯乡相逢村，为明代早期建筑。名冢五个：冯异冢，铎期、铎刚冢，岑彭冢、曲王冢。古文化遗址五处：子昌村的裴李岗遗址和仰韶遗址，大吴坡的仰韶遗址，禹寺和小坡掌、西后津的龙山遗址等。

历史名人有韩愈，系唐宋八大家之首。苏东坡说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薛所蕴，著述颇丰、有《澹友轩文集》、《桴庵正续诗集》行于世。近代的汤仲明，早年留法勤工俭学，立志实业救国。学成回国后，发明了木炭汽车，为社会贡献甚大。

(四)

孟县地处交通要塞，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正如旧志评其地曰：“当天下之要冲，西连关陕，东通汴梁，南北抵京都而达襄楚，可谓势胜之地也。”抗日战争时期，日军盘据沁阳，占据孟县，把孟县作为挺进豫南和关陕的跳板。解放战争时期，太行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亲自在孟召开重要会议，部署解放豫北计划；1946年元月，黄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军事调处执行部”曾到孟县调解国共两党争端。同年8月，太行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亲临孟县部署“八三”战役的战术，1948年秋，中原军区政委邓小平同志从西柏坡开会后经孟县赴豫西南，途经白坡渡口时，指示孟县修造一艘能载一个团装备的大船，以迎送大军南下，参加淮海战役。

七十年代初，焦（作）枝（城）铁路已由县境西部通过，孟（县）济（源）地方小铁路也正式通车运行，特别是1977年洛阳黄河公路大桥在孟县西部架起，变天堑为通途。

(五)

解放后的几十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孟县的工农业生产大有提高，工业已初具

规模，据1985年统计，工业企业已发展到107个（不包括乡镇企业），主要有化肥、造纸、机械、轧钢、纺织、建材、食品加工等，职工总数达10037人，生产总值12309万元；乡镇企业主要产品有玻璃、酿酒、化工、电料、纺织、养殖、淀粉、食品和其它农副产品加工，总数为3151个，年产值完成15694万元。农业收入也很可观，总产达23540万斤，产值为22202万元，人均产值782元，比建国初的50元超15倍还多。

文化教育事业也有很大发展，全县已普及初中教育，学龄儿童已全部入学。1985年小学为181所，在校学生27342人，教师1649人；初中66所，学生15624人，教师1247人；高中5所，学生2385人，教师197人。医疗事业，全县城乡医院14所，医职员工714人，病床630张；个体开业103处，医护人员487人；农村医疗室241处，医护人员630人。全县人民的身体健康，得到了很大改善。今天的孟县，政通人和，百业俱兴，人民安居乐业，经济繁荣昌盛，各行各业都发生了地复天翻的变化。全县各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自力更生，发扬艰苦创业精神，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目标而奋斗。

孟县志总编室供稿（阎庆豫执笔）

韩愈籍贯考察述略

尚 振 明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上旬，在我国东南海疆名城汕头市举行了国际“韩愈学术讨论会”，笔者就韩愈籍贯考证发表了讲话，得到了世界名人的公认和题词，确立了韩愈是河南河阳（今孟县）人，结束了一千多年的争执和疑问。

韩愈墓冢位于孟县城西六公里韩庄村北紫金山之阳、古朴高大，冢前古柏苍翠，祠院静雅，南濒黄河，北嶂太行，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就安葬在这里，已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是我国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不仅他的散文、诗歌雄奇奔放，而且他刚阿不屈、鞠躬尽瘁的精神，也引起世界学者的重视和探讨。然而，他的籍贯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史无定论。较为流行的有昌黎、南阳、修武、孟县等四种说法。为了澄清这个问题，笔者于1983年9月至翌年7月，北上北京、昌黎、锦州、沈阳、东转蓬莱，南下邓县、宜春、韶关、阳山、潮州；近访修

武，行程两万余里，猎取可靠资料，确立韩愈系河阳（今孟县）人。

关于“昌黎”说，出自《旧唐书》上的记载，《旧唐书》的记载是否准确，笔者到了昌黎，考察结果，韩愈不是昌黎人。当韩愈自称昌黎时，那里叫广宁县，他死后365年，即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才改为昌黎县。至于“昌黎伯”是韩愈死了260年以后，宋神宗于元丰七年（1084）本其郡望追封的；访其韩氏后裔韩宝琦老人，他说：“我县韩氏先祖是从山西迁移来的，并非韩愈后裔。”查其昌黎县的两座韩文公祠均与韩愈籍贯无关，一座是明末范志完（河南虞城人，明末进士）于崇祯辛巳年间（1641年）为敬慕同乡韩愈而修的，另一座是洪武四年（1371），因县名与韩愈自称昌黎相吻而修的，现在均已拆掉。韩愈所以自称昌黎，是与郡望有关。南宋理学家朱熹在考证韩愈籍贯中早已指出：“是时昌黎之族颇盛，故遂称之。”（《昌黎先生集考异》）

为了排除义县、朝阳县是韩愈祖籍的可能性，笔者又亲临锦州、沈阳考察，均无韩愈宗祖的遗迹、遗物、后裔和传说。

到南阳考察结果，弄清了孟县古时候的南阳，和现在的南阳是异地同名，宋人在编纂《新唐书》

时，误认为韩愈的籍贯是今天的南阳，所以在“南阳”之前加上“邓州”二字，贻误后世。笔者在南阳走访了韩氏后裔居住的韩凹村和柳林村，均有碑记证明，他们是在明朝初期由河阳迁居南阳的。如清道光十五年（1835）所立的祖碑上，首行写道：

“余家系出河阳，自唐宋元明宗族甚众”。后裔韩训杰说：“为了查访韩祖，我自费到修武、孟县走访，确认孟县韩文公墓是我们的祖塋。”

笔者在修武县走访了七十多岁的老文物干部石云山，他说：“韩愈是修武人的说法，证据不确切，特别是1979年4月，为答复徐州大学李教授的来信，我们又深入调查，结果仍然不能使人信服。陈继儒在《偃曝余谈》里所说的修武三十里曰南阳，韩文公之故里也，并无此地。况且在修武境内尚未找到韩愈祖塋、墓冢、后裔、家谱、宗祠和传说等”。

在各地考察的基础上，对孟县重新考察。孟县有韩愈之子韩昶墓志，明朝万历年间在祖塋苏庄出土；有韩愈墓祠、墓冢，墓前有唐柏两棵和历代碑记；有侄孙韩湘墓，有韩愈嫡系后裔、家谱、封爵印信、石刻造像等许多合情合理的文字和实物证据。

在历代考证和韩愈的著作中，也有端倪稽考。朱熹在《韩文考异》中说：“《元和姓纂》《唐书